

中共上海党史资料选辑



上海电信系统
职工运动史料

第二辑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

上海电信系统职工运动史料

第二辑

(1945.9—1949.5)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
上海邮电工运史料征集小组编写
一九八七年二月

目 录

解放战争时期上海电信局、国际电台

- 中共地下党的组织建设概况……………征集小组(1)
- 反动势力在原上海电信企业内的状况……………征集小组(7)
- 上海电信职工的反甄别考试斗争……………征集小组(12)
- 上海电信职工的怠工斗争……………征集小组(19)
- 上海电信职工的饿工斗争……………征集小组(30)
- 记一九四七年底开展争取年终
 - 双奖斗争的情况……………征集小组(41)
- 上海电信局报差间抵制国民党
 - 发展党员的斗争……………征集小组(47)
 - 上海电信局报差间的反迫害斗争……………征集小组(54)
- 上海电信局、国际电台地下党领导下的
 - 群众组织和群众活动……………征集小组(59)
 - 一、刘行收讯台职工创办的生产消费合作社……………(59)
 - 二、长途台女话务员要求按时发给
 - 夜班津贴的斗争……………(61)
 - 三、无线报房职工建立的夜班伙食团……………(63)
 - 四、组织歌咏团,把积极分子团结在党的周围……………(65)
 - 五、横浜桥的图书馆、学术研究会,
 - 读书会及电影放映队……………(67)
 - 六、记国际电台员工福利会的一些活动……………(70)

回忆在上海电信局进行上层工作的

- 一些情况……………杨文圻(74)
- 上海电信系统地下党领导的护局护台斗争……高铭华(82)
- 上海电信局的护局斗争……………征集小组(91)
- 上海国际电台的护台斗争……………征集小组(114)
- 国际电台护台回忆……………卢宗澄(130)
- 关于争取上海电信局长留沪的一些情况……………樊寅珍(133)
- 记真如发讯台的护台斗争……………(136)
- 一张碉堡方位图……………顾星牧(141)
- 记南翔发讯台的护台斗争……………张以进(142)

解放战争时期上海电信局、国际电台 中共地下党的组织建设概况

上海邮电工运史料征集小组

解放战争时期，上海电信部门党组织领导电信职工同国民党电信当局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并在上海解放前夕，组织职工护局护台、迎接解放，完整无损地保存了电信企业；同时，在斗争中加强自身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发展壮大党的力量，以不断适应工作的需要。现把上海电信部门党组织在这一时期中的建设情况，简叙如下：

抗战胜利初期，上海电信部门党组织对国民党电信当局采用甄别考试、企图大批裁退“华中”职工的做法，领导电信职工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虽然仍有一部分职工被“甄别”，其中也有一些党员，但广大职工通过斗争，提高了政治觉悟，打破了对国民党的幻想。在此同时，党组织一面把已暴露的党员如陆亮、梅继范等人撤离电信部门，一面要党员吴勋、钱敏君等人利用机会，争取重新进入电信企业，并要积极分子沈切投考雷达无线电学校，以便伺机地进入国际电台。

一九四六年一月，上级党组织决定把留在电信部门内、原分属于职委、工委领导的党员合并成为一个组织，即在福州路成立了报房支部，由吴勋和钱敏君分别担任正、副支部书记，张恩全为支部委员。该支部属上海地下党职委敌占企业委员会领导，支部的上级领导人为李庆发。当时，上海电信局电报部门和国际电

台同设在福州路七十号，报房支部的党员中计有国内报务员五名、国际报务员二名、递报生六名、长途话务员二名、报差一名，共计十六名。

一九四六年“怠工”斗争前后，党支部在积极分子中发展了十几名党员，其中有报差间的邵安祥、何玉峰；报房的沈切、李五福、王骏发、王水娥、高铭华、周思源、孙秉祥、虞宝珠等人。

一九四六年二月，国际电台和上海电信局分开设立，同年四月，上级在国际电台建立了党小组，由从上海新药业转来的钱乃慧任党小组长，小组成员有顾连根、沈切。党小组由李庆发直接领导。

同年十月，上级在电信局报差间单独建立了党支部，由邵安祥任支部书记，何玉峰、胡宏琪为支部成员。该支部也由李庆发直接领导。报差支部成立后，根据报差的特点，利用封建帮会和群众互助的形式，团结教育报差，独立开展活动。

报房支部书记吴勋在职工中享有较高的威信，由于领导“怠工”斗争，被业务处长李桐调入了业务处。吴勋因无法开展活动，不得不撤离电信局，后转移到浙东游击纵队电台任队长。支部工作从一九四六年秋起，改由钱敏君负责，张恩全则公开出面领导职工斗争。当时工运处于低潮阶段，又因筹建职工会“流产”，党组织决定党员分散隐蔽，秘密联系，积蓄力量，为今后的斗争作好准备。

一九四七年春，随着社会上民主运动的不断发展，局、台职工的斗争激情也日益高涨，纷纷要求电信当局改善职工的生活待遇，党组织给予了及时的引导，于五月爆发了一场“饿工”斗争，取得了较大的胜利。这场斗争锻炼了一批积极分子，为建党创造了有利条件。但电信当局把这场斗争的主要领导人列入了黑名单。李五福、何玉峰等人受到了当局的传询警告；张恩全被调到市郊刘行收讯台；钱敏君也不得不暂时停止了活动（后于一九四

七年底撤退离局)。党组织决定从七月起把福州路振房党的关系交高铭华、周思源负责，通过他俩联系其他党员，做更艰苦扎实的工作。

一九四七年六月，上级决定把国际电台、电信局横浜桥部分同福州路部分(报差党支部除外)的党员合起来，成立电信党支部，以加强党的统一领导，由杨文圻任支部书记，钱敏君、钱乃慧为支部委员。杨因在成都电信局参加、领导了一九四六年二月的怠工斗争，被当局列入黑名单，党组织要杨立即离开成都。杨设法于当年九月调来沪局工作，并在十一月接上了党组织关系。上海地下党职员工作委员会委员王致中要杨通过他同电信局局长郁秉坚有亲戚关系的有利条件，开展上层工作。电信支部成立后，杨除单线联系横浜桥的党员外，还联系国际电台的钱乃慧、沈切。电信支部的上级领导人先是李庆发，后是王一峰。一九四八年一月，张恩全去香港学习后，杨又联系张转交的刘行收讯台的龚振东。同年四月起，杨又负责联系福州路的工作，直至张恩全从香港回沪联系高铭华为止。张恩全从香港回沪后于一九四八年五月参加了上级党组织市政系统工作委员会，为委员。这之后，张曾代表上级组织来联系局、台党组织，直至同年十月撤退为止。张撤退后，局、台党组织仍由王一峰领导。

电信支部建立时有党员二十四名，除在本单位发展的张静贞、宁涌生、程星华、范国燊、沈菊英、俞国兴、左贞祐、周允贤等十余名党员外，还有从大学和女青年会等单位转来关系的党员，有沈尧泉、仇启真、周同福、孙方玖、梁根荣、林秀伟、金蕊芬等人。组织的发展、队伍的扩大，使党的战斗力得到加强，党的群众工作更加活跃，党与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

一九四八年七、八月间，杨文圻获悉成都有个姓邓的被当局逮捕了。杨在成都时曾介绍此人入党，后得悉邓又脱党，杨曾找邓谈话，邓表示不愿再找党的关系。故杨即向上级请示要否转

移。经上级领导研究后，即决定杨在八月撤退去解放区。杨文圻撤离后，电信支部的党员在短期内采取分别联系的方式来保持组织关系。不久，党的组织形式根据形势的变化，从集中转向了分散，在电信局横浜桥、福州路和国际电台分别建立了党的组织。

一九四八年夏，电信局福州路部分(报差支部除外)重新成立了电报支部，由张恩全兼支部书记，高铭华为组织委员、孙秉祥为宣传委员。张于同年十月底撤退后，由高铭华接任支部书记，李五福、陆祖良为支部成员。

一九四八年秋，上级决定在国际电台成立支部，由沈切任支部书记，并在电信局横浜桥部分也成立了支部，由孙瑞珍任支部书记。

为了保存党的力量，从一九四八年下半年起，先后把已被敌人注意的七名党员撤离上海，去了解放区。最先走的是杨文圻和邵安祥。邵因行动被当局监视，上级在八月份通知他去苏北解放区。同年十月底，党组织考虑到张恩全找不到职业掩护，又是当局注意的重点对象，不便留沪，决定张撤退。钱乃慧因在黄色工会理事会上的斗争，早在四月份已被当局调到了设在南京的国际电台南京支台。同年十月钱和张恩全一起撤往苏北解放区。何玉峰和周思源分别在十一月和十二月撤离了上海。王敏菊在一九四九年初也被迫撤至苏北解放区。这七名党员在上海解放时随解放军返沪，参加了上海电信企业的接管工作。

为了迎接解放，加强对护局护台斗争的统一领导，上级党组织——邮电党委根据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成立了上海电信系统地下党总支委员会，由龚振东任总支书记、高铭华任总支副书记，沈切为组织委员、李文奎为宣传委员。

一九四八年底，上级决定调李文奎、沈切去筹建党团，由李文奎、沈切分任正、副书记，后改由沈切负责党团的实际工作。上级领导人是吴良杰、王一峰。一九四九年初，电信系统总支委

员会委员改由左贞祐、孙瑞珍担任。

此外，为了配合接管工作的需要，上级党又在电信部门成立了接管支部，由张君实任支部书记，宁涌生为组织委员、范国燊为宣传委员，以后，姚明统也参加了接管支部。该支部的上级领导人是梅洛。到上海解放初，该支部公开时更名为接管小组，并吸收吴晚琴参加工作。

总支、党团、接管支部三个组织是平列的，都受邮电党委的领导。

电信总支下设四个支部，一个分支部，到上海解放时，共有党员七十七名。

1. 福州路电报支部

福州路电报支部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起，到一九四九年五月底止，由李五福任支部书记，张静贞、陆祖良为支部委员。支部在报房、中央室、营业室等单位和技术要害部门发展了十名党员，新建立了两个党小组。同时，刘长前（原名贾岭升）、李志仪、王立诚、葛福民的组织关系也由中华业余图书馆、震旦大学等单位转到了电报支部。到上海解放时，该支部共有党员二十七名。

2. 福州路报差支部

福州路报差支部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起到一九四九年五月底止，由骆连森、丁伯泉任正、副书记，胡宏琪为支部委员。报差支部从一九四六年六月建立以后，从未中断过，保持了支部的连续性。邵安祥、何玉峰撤退后，支部又发展了六名党员。到上海解放，该支部共有党员十名。

3. 国际电台支部

国际电台支部从一九四九年一月到一九四九年五月底止，由沈尧泉任支部书记，该支部在报房、中央室共发展了七名党员。到上海解放时，该支部共有党员十二名。

4. 横浜桥支部

横浜桥支部从一九四九年一月到一九四九年五月底，由余韵亭、樊寅珍任正、副书记，吴婉琴为支部委员。该支部在长途台、科室和技术部门先后发展了十名党员。到上海解放为止，该支部共有党员二十名。

除上述四个支部外，在一九四九年初还成立了刘行收讯台党支部，共有四名党员，电信总支书记龚振东指定俞国兴为分支部的书记，由龚直接领导。龚还联系闸北、西康路支台的四名党员。

为了加强开展护局护台斗争的宣传工作，电信总支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宣传小组，由吴婉琴任组长。

此外，上海郊区地下党从一九四九年初起，在真如地区，通过举办学校的方式，先后发展了国际电台真如发讯台的魏宝泰、吴德祥、沈大根、祝汝兴、钱惠林、孟宝祺和何宝生入党并建立了党小组，由魏宝泰任党小组长。上海郊区地下党成立真如区委后，该党小组直属真如区委领导。当时组织关系在局、台外的地下党员还有若干人。

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在党的正确方针指引下，地下党组织的活动蓬勃开展，党员经受了考验，作用得到了进一步发挥，同时还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上海邮电员工联合会，深入地、广泛地宣传形势和政策，放手发动和依靠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保证护局护台斗争的顺利发展。广大职工响应党的号召，艰苦奋斗，坚守岗位，以主人翁姿态，确保了企业安全和通信畅通，终于胜利地完成了各项任务，迎来了上海的解放。

反动势力在原上海电信企业内的状况

上海邮电工运史料征集小组

原上海电信部门是国民党当局统治人民、进行内战、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重要工具之一，同时对整个社会经济又有着密切的联系。反动统治集团为了加强控制电信部门、镇压和分化职工运动，以秘密或公开的方式，先后在上层职员中发展党羽，拉拢和收买亲信，监视和限制进步职工的活动。接着，又在职员和工人中间先后建立了各种反动组织，进行破坏活动。

一、社会局插手电信职工运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上海电信当局为了镇压职工运动，先是勾结国民党上海特别市警察局局长俞叔平，由其派警察在局内外巡查，监视职工的活动，威胁职工要“安于职守”。后来，警察局提出：“警局只负责治安，局内纠纷无权过问，此类事件归社会局处理”。于是，上海电信当局即转向社会局寻求帮助。电信局副局长陆鸿勋和社会局局长吴开先早就相识，经陆向吴提出要求后，吴即派人来局，但遭到了职工的抵制。吴虽在表面称：“社会局只负责调解劳资纠纷，上海电信局系国家机构，不属于劳资范围，亦无权处理。”但又暗示陆说：“关于工运事，我们介绍工人福利会帮你们解决，他们负责领导全上海的工会，你们可去与陆京士谈谈。”

陆京士在当时担任国民党政府社会部组训司司长、社会部京沪特派员，从一九四六年二月起又任上海特别市工运党团指导委员会主任。这个组织对外名称是“上海工人福利委员会”（简称工

福会，下同)，受市社会局及社会部的双重领导，其组织原则是：社会局同当地党部、军、警、宪等有关机关设立工运指导委员会统一指导工运，并于各工会中建立党团组织以资运用，从而成为上海市控制和镇压工人运动的主要堡垒。郁秉坚和陆鸿勋约期会晤了陆京士，陆满口答应，即指派魏镛为电信局和国际电台的特派员，并让他挂名为电信局的人事室专员。魏是陆京士的一名得力干将，他被委任为驻电信局和国际电台的特派员后，即着手组建局、台两单位的反动组织，调查进步职工的情况，策划镇压职工运动。

1. 组建国民党区分部

一九四七年七月，魏镛在电信局通过夏根有（报差间总稽查）、华鑫生（报差间差目）在报差中间强行分发国民党入党登记表，并以骗取照片、偷盖图章、威胁利诱等方法，共拉拢了一百三十余人加入国民党。魏把他们划分为十三个小组，选出金玉龙、夏根有等七人为委员，执行委员是：金玉龙、夏根有、王新海；候补委员是：顾根发、陈受璋；书记华鑫生；顾问郁秉坚。一九四七年八月，魏镛在立报馆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上海特别市第四十一区分部成立大会。在成立大会之前，夏根有去爱棠路市党部领取证章六枚，发给夏根有、华鑫生、王新海、顾根发、周小云、陈受璋等六人。

在国际电台方面，魏镛利用报差朱根林想当报差稽查的欲望，以此作为交易，要朱发展国民党员，筹建一个区分部。朱首先拉拢庄志湘、戴志云、高永德等人为委员，朱为主任委员，又先后发展二十多名国民党员，并于一九四八年在立报馆举行宣誓仪式，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上海特别市第十七区分部。

四十一区分部和十七区分部均隶属于中国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第五区党部。

2. 成立武装“护工队”。

一九四六年七月，上海特别市“工运党团指导委员会”决定组织上海特别市护工总队，其目的是“在必要时，即可以正当防卫、予异党以有力打击”。陆京士曾称：为实行武装控制各企业，便于进行恐怖活动。因此，“工运党团指导委员会”必须组织护工总队。由陆京士自任总队长，对少数骨干分子还配发手枪。

一九四七年七月，魏镛、夏根有、孔凡均(技术员)、汪学钧(报务员)等人分别在上海电信局和国际电台筹组护工队，在电信局设一分队，国际电台设一中队。护工队的发展对象主要是报差，后又扩展到报房以及电信人员训练所毕业的一部分年轻同学，由他们在报差间和报房内来往巡视，藉此威胁进步职工。

一九四七年九月，魏还选派汪学钧、顾光道、孔凡均等内定的黄色工会理事和其他骨干多人，到陆京士举办的社会工作人员训练班受训，为筹组黄色工会培养必要的骨干。

一九四八年十月，电信局和国际电台两单位的护工队合并，成立了一个中队，隶属于上海特别市护工总队第十四大队，由魏镛、孔凡均分别担任正副大队长；汪学钧、夏根有等人分别担任正副中队长；另设督练员，特务长和司书各一人。中队下设三个区队，各区队又下设三个分队，共有护工队员七十多人，各级干部三十多人。该队曾在信谊药厂召开会议，布置参加全市户口大检查等活动。

3. 组织工人福利会

根据陆京士关于在上海电信局成立工福会的要求，魏镛在成立了两个国民党区分部之后，一面有重点地在报差间建立护工队组织，一面又着手筹建“工福会”组织。魏派夏根有、汪学钧负责筹建上海电信局工福会，派孔凡均等人负责筹建国际电台工福会，在报差间、报房、营业科、册报股等科室发展了“工福会”一、二、三级干部五十多人。他们持有三种不同颜色的干部证件，分布在各部门，充当反动当局监视进步职工和收集情报的耳

目、走卒。

由于建立了上述的反动组织，魏镛终于在各门物色了一批能为他效劳的人员，通过他们了解职工的活动情况并研究对策。如汪学钧曾抄送过进步职工的名单，也曾把中共地下党员的照片交给中统上海办事处的外围组织——劳工协进社。魏还曾亲自布置专人监视地下党员周思源的活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魏还直接勾结淞沪警备司令部，先后逮捕了公报房的朱树铮和报差间的报差孙振邦。孙振邦被捕后，全体报差在报差间地下党支部的发动、组织下，采取写联名信、扬言要怠工等方法，迫使郁秉坚、李桐出面同警备司令部交涉，要求放人。但警备司令部称孙振邦的问题，必须与工福会联系。经郁写信给陆京士后，孙才获释。

二、建立中统通信员组织

一九四八年十月，国际电台派送间报差管理员沈荣华，经中统特务俞振鹏介绍，参加了中国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上海一站，为义务通信员。随后，沈在中统上海站主任王冰的直接领导下，在派送间先后发展十人为中统义务通信员，编为一个小组，由沈荣华任组长。他们一面利用投送电报之便，为王冰递送信件，发帖子，送情报；一面又在电台内部收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活动情况。地下党员沈切、左贞祐等人就曾受到他们的监视。

综上所述，各种反动组织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上海电信企业内部逐步形成，它们虽然派系不同，但有着共同的目的和任务，即采用各种手法，分裂职工团结，打击进步力量，破坏职工运动。

除了上述反动组织外，还有以各种宗派形式出现的封建帮会、社团，以及从军、政、警、宪等系统转入电信部门的成员，截止上海解放时止，有各种反动身份的职工达六百多人，约占当时职工总人数的17%左右。

此外，国民党政府交通部电信总局副局长钱其琛为了及时掌

握上海电信局的情况，于一九四七年五月“饿工”前就派马定良到上海电信局任职，传递消息，便于其利用行政命令，指令上海局对进步职工进行人事调动，以此来打击进步力量。

上海电信当局在各级行政主管人员中也安插了一些人员，严密控制职工活动。这些人利用各自的主管工作岗位，对职工运动和进步职工，进行阻挠、限制、监视和打击。

但是，不管反动势力打着什么旗号，采用何种手段，上海电信局和国际电台的广大职工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挫败了反动势力的各种阴谋破坏活动，最后通过护局护台斗争，保证了企业的完整，保证了通讯的畅通。迎来了上海的解放。

上海电信职工的反甄别考试斗争

上海邮电工运史料征集小组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电信接收大员在接收日伪华中电气通信公司之前，为了排斥一批进步职工，曾企图借日本人之手来开除十四名递报生(其中四人是中共地下党员)，由于地下党组织领导职工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目的未能达到。于是，他们就在接收“华中”之后，采用甄别考试的办法来达到这一目的。

九月十五日，国民党电信接收大员在以交通部江苏省江南区电信规复处的名义、正式接收华中电气通信公司的第二天就宣布：上海沦陷期间的在职职工都是“伪人员”，一律要经过甄别考试才能重新录用。这消息使大家感到十分气愤。八年来，国民党消极抗日，使大片国土沦陷，上海人民在日寇铁蹄下受尽了侮辱，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好不容易盼到了胜利，谁知接收大员一来，竟给职工戴上了一顶“伪人员”的帽子，难道这就是盼来的胜利果实吗？面对人格的侮辱和失业的威胁，大家感到十分愤怒和忧虑。针对国民党上海电信当局的阴谋，地下党组织及时提出了两条口号：一是反对称伪人员；二是反对甄别考试，并指示党员要关心职工的切身利益，做深入的发动工作。这两条口号很快得到了广大职工的热烈响应，并成为大家一致行动的目标。斗争迫在眉睫，党组织决定由党员吴勋和张恩全公开领导反甄别考试斗争。吴勋除团结一批递报生和积极分子外，还做了其他人员的工作。他向大家揭露电信当局搞“甄别”的阴谋，阐明了职工要饭吃、要工作就得反对甄别、反对裁员的道理，取得了各方面的

同情和支持。大家感到要象前不久争取105万元生活维持费那样，团结一致去斗争。吴勋等人又进一步发动各部门职工推选代表与当局谈判，向当局说明在“华中”工作的人员，长期以来从事通信业务，都已具备实际工作能力，甄别是多余的，而复员职工不熟悉业务却不要甄别，这是歧视在“华中”工作的人员，要求当局一视同仁地对待所有职工，停止甄别考试。但谈判没有结果。当代表们正相继在海岸电台和华中电信学院等处商谈研究的时候，当局突然张贴布告，公布甄别考试的日期和考试内容，规定报务员等除考专业知识外，还要考英文、代数、三角、几何、作文；递报生也要考英文、国文、物理、数学等课目，考试按报务员、话务员、技术员、机务员、业务员、递报生等不同工种分批进行，并强调不参加考试者作自动退职处理。当局的蛮横决定，在职工中引起了极大的愤怒。党组织决定因势利导，及时组织、发动职工，进行一次群众性的请愿活动，并经过代表商议，一致同意停止工作，走向社会，扩大影响，揭露当局的甄别阴谋，争取社会各界的同情和声援。

第二天(九月廿九日)上午十一时，一批递报生进入报房，动员大家去集体请愿。经过广泛宣传之后，林宗耀、刘德祺拉掉了二楼、三楼的电源闸刀，机器停止运转。与此同时，沈切等人分头打电话通知提篮桥、真如发讯台、南翔发讯台、刘行收讯台、横浜桥长途台等部门。这些部门也先后停止了工作。接着，六百多名职工在福州路(四川路口)局门口集合，大家手持彩旗，上写反对甄别考试等口号，列队出发，步行到横浜桥，向电信规复处请愿。这支六百多人的请愿队伍，在抗战胜利初期，还是第一次出现在上海街头。他们秩序井然，边走边宣传，影响很大，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同情。横浜桥长途台的话务员们听到福州路电报部门职工请愿来了，马上列队赶到虬江路迎接，并加入请愿队伍。